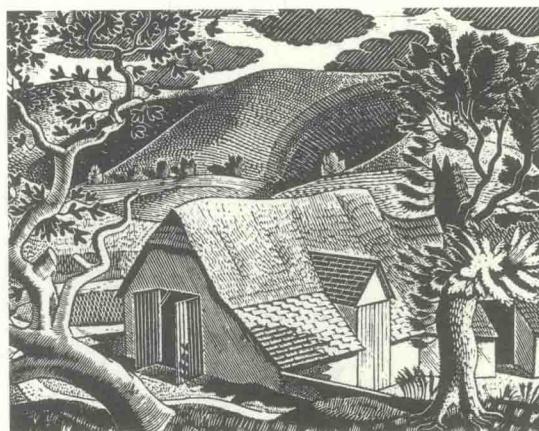


中国现代
文学馆
青年批评家丛书
第二辑

金理 著

青春梦与 文学记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金理 著

青春梦与 文学记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梦与文学记忆 / 金理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6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24384-8

I. ①青… II. ①金…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9999 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384-8/1·278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2.5 印张 302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丛书主编 吴义勤

丛书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于 1985 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二十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为了加快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建设的步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从 2011 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并希望把客座研究员制度与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问题不仅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整个青年作家队伍乃至整个文学的未来都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青年评论家成长滞后，特别是代际层面上“70 后”“80 后”批评家成长的滞后，曾经引起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焦虑。因此，客座研究员的招聘主要面向“70 后”“80 后”批评家，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学术平台为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经过自主申报、专家推荐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招聘了

目 录

丛书总序 吴义勤 3

第一辑 青春梦与文学记忆

| | |
|----------------------------|----|
|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中的青年形象 | 3 |
| 汉园里的青春：读《断章》和《画梦录》 | 29 |
| 青春梦与文学记忆：读《三年记忆，四年忘却》 | 37 |
| “80后”写作的三重研究视野 | 42 |
| 宅女，或离家出走？ ——当下青春写作的两幅肖像 | 59 |

第二辑 写在文学史边上：现象与阐释

| | |
|------------------------------|-----|
| “名教”的现代重构、讨论方法及其批判意义 | 83 |
| “对于名分的逃遁”与“生命的份量”：从沈从文与施蛰存说起 | 104 |
| 施蛰存的“岗位”：以“文学工场”与水沫社时期的实践为例 | 118 |
| 施蛰存的“岗位”：海派多元文化观与商业环境中的斡旋 | 151 |
| 知识分子人文传统与当代文学批评 | 172 |

第三辑 写在文学史边上：方法与重构

- “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与“外部的批判支点”
——“境况中”的文学及其释读 193
- 反躬自省的“医生”与拒绝被动的“病人”
——从这个角度讨论文学中的医疗与卫生话语 219
- 心态·身份·际遇
——小说中的阅读史分析 235
- 文学史“事实”“事件”的缠绕、拆解
——以一封书信为例展开的话题 257

第四辑 批评与想象

- 身体与灵魂驳难中的“罪与罚”
——读《爱人有罪》 277
- 历史细节与文学记忆
——《野葫芦引》的一种读法 285
- 荒原跋涉中的自省：论《风雅颂》 295
- 从夏济安的《香港——一九五〇》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〇》
——一首诗与一篇小说的关联阅读 309
- 《白口罩》的写作难度 320
- 写小说的手艺人：哲贵论 327
- 招魂幡，与无尽的谜
——《成为和平饭店》印象记 334
- 致张新颖老师：谈余华 341
- 跋 354

第一辑

青春梦与文学记忆

在“角色化生成”与“主体性成长”之间，在决定论和能动性之间，在福柯和存在主义之间，在政治经济学和精神分析之间，在外在询唤和内在期待之间，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应该得到更加精致入微的辩证。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中的青年形象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充满了青年人的形象与声音：晚清小说中的革命少年、鸳蝴派笔下多愁善感的少男少女、五四新文学的“青春崇拜”、社会主义成长小说中的“新人”形象、知青的“青春祭”、“一无所有”的摇滚青年、“像卫慧那样疯狂”的上海宝贝、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笔下的“80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形象世界，主要是青年的世界”。^①文学形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综合创造物”，故而对此形象的解析，也应尽可能还原出构成因素的多样性：在作家塑造青年形象的过程中，首先参与其间的是作家的气质、心理和审美意识；而这些联系着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人们的情感态度、认知方式和思想观念；上述因素在渗入创作的过程中显然又和历史条件、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等形成互动。讨论青年形象的创造史，既能丰富我们对文学特质的认识（思考青年形象在文学中的建构，即青年人如何通过文学来想象自我），也能在与历史经验的关联中丰富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

^①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20页。

—

在晚清中国社会中，“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独立的年龄群体的青年阶层”。日本学者横山宏章曾从官僚、科举制度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历史，那其中却见不到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这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那么，中国的年轻人是在什么样的世界中顽强地生存着呢？不管怎样，不可能没有年轻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完备的所谓中国式的官僚制度严格控制下，在成为无可动摇的‘天下太平’的安稳世界中，年轻人其实是被窒息在体制之中，奄奄一息……在知识分子的世界中，通过科举考试入仕途登龙门是男人们的人生愿望，年轻人像个年轻人似的生龙活虎地到处胡闹，是不被允许的。为了中举必须奉献出青春，青年人只是成年人的预备军。只有天真纯洁的孩子和出色的大人，愚蠢莽撞的青年人的存在被抽掉了。……说没有年轻人、青年人存在，这是因为年轻人被定位在从孩子到大人的修养过程中，也就是说，它不过是一种过渡形态。”^①近代中国“青年”形成的契机是民族危机与教育改革。梁启超振臂一呼的《少年中国说》，对于当时正在形成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年轻人群体之社会地位、义务职责等作出了最具代表性的论述。中国的“青年”正是从由梁启

① 横山宏章：《清末中国青年群像》，转引自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3页。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缺失“青年期”，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著有《儿童的世纪：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儿童与童年》的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曾如此记述：“在中世纪以及近代开始以后，低层阶级的儿童，一旦能脱离母亲或奶妈而独立行动（即约7岁时），便与成人们混在一起了。他们马上便闯进成人们的生活圈子里，与成人们共享工作与娱乐，老少不分。”（参见理查德·弗拉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李青、何非鲁译，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8页。）在工业化开始以前的欧洲社会，年轻人与年长、年老的人们一起生活在家庭和传统的共同体中，既不存在各个年龄阶层间明确、严格的阶段区分，年轻人也并没被赋予特殊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

超所呼吁的“少年”经由《新青年》杂志所代表的“新青年”而逐步形成的。^①

自晚清、新文化运动以来，统治团体、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以及知识分子、普罗大众都在不断树立各种各样理想的、模范的青年形象，“少年中国”的国民召唤、“新青年”式的范导想象、“社会主义新人”的打造……青年形象史的生成、延续，伴随着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势力对于“青年”所寄予的角色期待和青年自身具备的角色意识（呼应社会期待而扮演相应的角色）。“角色”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其定义是“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应有行为的模式或规范”^②，这种“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期望经常出自同时代的人或社会群体。“新青年”“五四青年”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中国获得特殊地位，并成为占据主流的青年角色模型，并不仅仅出于青年自身的反抗精神和行动成就，也并不仅仅出于其集中表达了年轻人对权利、自由（恋爱、婚姻的自由，经济独立，自己筹划生活等）的强烈诉求（这一切诉求只有被纳入到“青年”的意义结构之中，才可能在中国社会获得正当性的源泉，而提供这一正当性的文化和思想资源，“主要不是来自于年轻人内部，而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思潮中既有的对知识人和青年的角色规定”^③），而恰恰是因为青年们呼应或者说迎合了社会对年轻人的角色期待。我们在此涉及了两个维度内的“青年”：作为现实社会中的年龄群体；被历史地、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形象。而文学显然是参与这一建构的最重要的文化式样，在青年文学中，寄托着成年人和社会力量的期待和意义规定、关于“青年是什么”“青年应该成为什

^① 详见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第一编：‘青年’的诞生”。

^② 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刘北成修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③ 参见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6—60页。

么”的观念意识，点点滴滴内化到了青年主体内部中去。不妨说，是青年的“角色化”提供了年轻人新的身份，因为这样的理由和身份，“青年”才在现代中国获得存在的正当性，而青年文学、青春主题也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上占据特殊地位。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小说的青年形象展演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角色化的生成”，而很少“主体性的成长”。台湾学者黄金麟在身体史学的视野中提出“身体生成”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指称的并不是一种身体的生物性诞生或创造，而是指称一种在肉体既存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模造。这种社会加诸自然条件上，从而产生的身体改变，是身体生成这个概念想要凸示的景况”，这样一种存在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因随着国族命运的更动而被积淀、型塑出来的”生成形式，逐渐变成“一个普遍、共通的身体开发形式”。^①而文学可以作为上述普遍、共通的形式在一特殊领域内的显现，小说中青年形象的塑造也受到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外力规约，诚如研究者在讨论现代中国的成长小说时所发现的：“成长主人公摆脱传统伦理与封建秩序的专断统治后获得身体的管理权和属己性，他们离开礼教之家后，身体在社会空间里的漫游、位移过程中，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机、国家危机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身体工具化和国家化的改造式生成。”^②在小说中的表现则是（这往往也成为我们分析这类成长小说的固定视角）：个人时间依附于巨型、线性的历史时间而存在，身体欲望处于社会理性的调适和监控之下，“象征之父”的权威性介入，个体成长作为民族国家的寓言……青年是建设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青春意象与情怀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一再书写的主题，但这

^①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② 顾广梅：《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7—338页。

一表面上风光无限、热力四射的群体和文学形象更多是被外力召唤出来的，这种召唤又着眼于“青年”社会角色的功利性，而对年轻人的特性、欲求、内在权利、精神自由以及生命原初意义关注不够。冯至的诗句“你让人都恢复了青春”^①，恰恰表现出青年构形的悖论：青春固然美丽，但却不是本己的属性，而是被种种“大他者”（“你是党，你是毛主席”）所给予、派定的。

在文学创作中，以“角色化生成”为主导来模塑青年形象，显然会出现很多问题。茅盾曾感慨于“伟大的‘五四’不能产生表现时代的文学作品”，郁达夫、许钦文、王统照、周全平、张资平等人的小说尽管“都用现代青年生活作为描写的主题”，但是“不能从这些作品里看出‘五四’以后的青年心灵的震幅”，而原因正在于“缺乏浓郁的社会性”。在茅盾的心意中，需要展现现代新人在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所参与和承担的宏大历史实践和社会职责，以及其间荡气回肠的心灵震荡。在这样的背景下，茅盾表彰《倪焕之》“第一部”的意义：“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城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②在叶圣陶的这部长篇中，主人公的个体成长被纳入到整个社会进化的结构中去，成为一种由社会理性掌控的成长，这也许是茅盾所谓“社会性”和“青年心灵的震幅”相参证的意义所在。青年人经历的“成长仪式”的每一环节——受难、动摇、转机——无不具有浓厚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倪焕之向往

^① 冯至：《我的感谢》，原载《光明日报》1952年7月，收入《冯至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② 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第20期，1929年5月。

通过参与创造历史的活动确立他作为一个青年的主体意义，但这一“意义”往往指向被某种社会理性、外在秩序所承认的信念。这样一个疏于内在主体建设的青年，其个人欲求与私密情感在不断“纯化”“净化”的过程中被掏空了“人”的具体所指，且陷入到理想与现实之间持续的冲突中。而一旦当历史丧失了发展的意义，即外部且是唯一的动力源停止运作之时，其精神和肉体都遭到了灭亡。正如研究者所发现——

伴随着每次对意义的新寻找，倪焕之不断改变表演场景，从学校，婚姻家庭，到集体主义的革命。在这一幻灭的过程，他的个体自我、个体自由在不断地耗散，国家、民族、阶级解放的宏大叙述越来越覆盖着他，最终他似乎又不能承载这些不断加大的意义而心力憔悴而死。因此，叙述者本身是矛盾的，他将倪焕之投掷于时代的飞泻而下的洪流，却表现出当这些时代的意义资源相继耗尽时主人公心力的枯窘——他没有时代以外的属于自身主体的内在意义。^①

当新一轮“时代的意义资源”——比如“革命文学”——生成之际，身处“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被认为“可以跨过前去，而不必关心他们，因为这是值不得在他们身上卖力的”^②环境中，茅盾曾表彰的倪焕之，以及他本人笔下的方罗兰、章秋柳们都成了时潮的“Outcast”（弃儿——英文为茅盾原文）。

^① 郑坚：《吊诡的新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6—107页。

^② 丁玲：《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

二

考察青年形象的人物长廊，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青年角色扮演意识膨胀的时期，年轻人表达自身欲求的空间越是萎缩。比如以“火红的青春”为主题的1950年代，后人提及青春崇拜之类的话题时每每将其作为怀恋对象，这确实是青年文化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它既是一个年轻人从家庭获得解放的时期，同时也是青年开始被国家高度整合的时期”，“程式化教育一方面要求学生活跃主动、富有创造力，一方面又要求他们自制克己、遵守各种纪律，服从集体的意志，这是十分自相矛盾的。……青年人几乎没有得以显示个性或发挥创造力的渠道。大多数学生都感到自己已被不断要求他们与集体保持步调一致的号召束缚得失去了活力”。^①一方面是“火红的青春”，另一方面，“在50年代的青年文化中，年轻人的主体性逐渐被抽去，‘新青年’、‘五四青年’们所追求和部分获得的‘权利’、‘自由’，在50年代的青年文化中逐渐消失”。^②王蒙创作于1953年的《青春万岁》^③素来被视作“火红青春的写照”，在这部长篇中我们正可发现上述矛盾的症候。小说描写建国初期北京女七中高二班一群学生的故事。这天，杨蔷云来到同学苏宁家中，苏的父亲是资本家，“五反”时候被抓：

蔷云握住苏宁的手，坐在苏宁的床头。……看看屋子，东北角上放着一个荒芜的书架。许多书报零乱地堆在上面，书架旁有个小藤桌，桌上有竹笔筒和瓷花瓶，但是既没有笔，也没有花。书架的对面是漱洗用具。……墙上挂着郑板桥画

^① 参见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经历》，史继平等译，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第155、156页。

^② 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第68、72页。

^③ 《青春万岁》初稿于1953年，出版于1979年。详见《王蒙文集》第1卷“说明”，华艺出版社，1993年。

的竹子和一张比月份牌高明不了多少的粗俗的画——画一个女人荡秋千。还有一张彩色照片，照的是西湖的三潭印月。苏宁床边摆着一张小桌，搁些药瓶子，暖壶和水碗。蔷云以她特有的灵敏嗅出一种奇怪的、不协调的气味。有药味，有香皂味，也有旧纸旧画和苏宁的被褥的味。蔷云嗅了嗅，说：“开开上边的窗子吧，空气不好。”……当蔷云登上窗台，去开上面的小窗户时，看见窗台上的一本书，是徐訏写的《鬼恋》。蔷云下来，拿起这本书，怀疑地翻着看，苏宁像作了错事似地低下头。“老天，你这是看什么书呀？”“我，病了，看别的书太累。”苏宁理亏地解释着。蔷云气愤地说：“‘鬼恋’，瞧这个名儿就是一本浑书。又鬼又恋，你瞧别的书累得慌，瞧这本书难道不气得慌么？”苏宁没有话回答，用手揉着被角，样儿很可怜。

于是第二天，蔷云动员了几位同学再一起来到苏宁家：

挽起袖子干起来。清扫了所有角落的尘垢，摆上了毛主席的石膏胸像。贴上一张《列宁和孩子在一起》的铅笔画和一张卓娅的画像。她们送给苏宁几本书：《把一切献给党》《刘胡兰小传》《青年团基本知识讲话》，苏宁把它们放在书架上最显著的地方。

我把上面这一段落理解为“空间的改造”。首先，“空间”在物理意义上指苏宁家中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发现了青年文学（如《青春之歌》等）中极具代表性的“角色化生成”策略：一个以青年人面貌出现的价值客体，有待去获得自我的本质属性，在此过程中，代表不同世界观、价值观与思想路线的两种力量介入其中，争夺对价值客体的领导权。苏宁病态初现，是一度沦落的价值客体，需要来自正义、主流社会